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 王金林

历史：思辨与实践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

姜佑福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 王金林

历史：思辨与实践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

姜佑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思辨与实践——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姜佑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9480-0

I. 历… II. 姜…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②黑格尔-G. W. F. -1770 ~ 1831-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B03②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2112 号

历史:思辨与实践——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

姜佑福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1 字数 177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80-0/B·458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史视域中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序

吴晓明 邹诗鹏 王金林

近些年来,我们与国内外的一些同仁一起,致力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终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实质性地开启现代思想变革,进而全面影响现代世界并开创现代新型社会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视域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涉和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视域的研究被长时间地延宕了,而其中的很多部分还停滞在粗疏草率的理解中。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其实质是从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向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概要地确定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这三个来源,正是欧洲近代启蒙传统在三个主要欧洲民族中的思想或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超越三大启蒙传统的突破口,则是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之时,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巅峰。英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成熟并与保守主义相关联,法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异质于保守主义的激进思潮,至于德国则刚刚形成其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潮。青年马克思从自由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当时欧洲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理论高度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与光大者。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潜存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很多思想,其“互文”结构往往需要回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如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康德费希特因素,黑格尔的法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辩证法等对马克思的影响,等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是要将马克思还原为德国古典哲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

展,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脉络,即世界历史的“德国站”是如何展开的,马克思的努力又在于如何超越这一“德国站”,从而要求通过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规划世界史。就此而言,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和穿透德国古典哲学。

然而,从思想史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方面,而应当如马克思学说本身那样,包含应有的学科丰富性。其中尤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为重点,正是这个领域包含着思想史上的丰富内容。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过来又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的变革及其回应,其结果是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借民族主义的全面兴起——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随后展开的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联手应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曾经对抗的社会政治思潮,逐渐协调起来,并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至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是强调与新保守主义的同一,以抗衡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与保守主义的回潮相伴随,则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基调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再度复兴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学科典范即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但是,19世纪50年代前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了重建并重释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证主义传统。接下来即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哲学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及其深受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的社会学,直接开创了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科学。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虽然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定位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别。

在现代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来自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学术传统的尤多,诸如曼海姆、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列奥·施特劳斯、熊彼特、波普、阿隆、萨特、阿伦特、福柯、鲍德里亚、福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史。他们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现代性世界展开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反证”自由主义与保

守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当然有必要重视来自外部的批判。但现在的情形却呈现出“一边倒”：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基于思想史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实质上否定性的研究，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层面对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及误读，实质上是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立场为前提的。因此，的确不能把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设定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论题，当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现成课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存在论层面的论证与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及其思想史层面的拓展及开掘，乃是内在相关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反思，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展开的自我批判。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拒斥或撇开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而在于在参考、借鉴且批判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水平 and 质量。

应当承认，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历史，相比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理论以及现实研究，相比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是不足且滞后的。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也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内史”研究，缺乏思想史研究应有的开放性与比较视野。然而，一门基于某种政治思想理论的学说或学科，必须具备明确的思想史研究或历史分析的自觉意识及其规范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十分必需，而且大有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加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与排斥变得越来越明显。以实证主义为学术基础的现当代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无批判地论证并解释现当代资本主义，晚近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更是只限于资本主义之一维。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止，西方主流学术界还有兴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性的资源，那么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则越来越拒斥而不是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源。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对学术界的宰制，意味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不可能从内部产生批判性资源。

在现代条件下，保守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作为主流社会政治思潮的补充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既承诺了现代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推进了现代性批判，进而使思想向着未来的筹划深入到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马克

思主义的批判,曾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实现了某种转化,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抗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中,实际上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未来向度,并逐渐建构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是,这个拒绝批判性介入的同质化世界,真的能够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吗?这一度是德里达、罗蒂、乔姆斯基等深感不安的问题,也是福山、奈斯比特等人关注的问题,更是众多激进左翼理论家焦虑而无解的问题。无疑,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要超越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框架,并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空间中,把马克思主义当年在近现代转型中发挥的巨大思想资源,再次释放出来。如是,则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不缺乏,反而更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与优势。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着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天独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这一被标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其新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形成的积极成果,也是一条有希望洞穿全球资本主义困境,因而异质于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并在未来的人类文明格局中有更大责任及作为的道路。对于这一已然扎根于并直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道路,显然需要、也值得展开思想史层面的广泛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诸多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对话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的内在关系;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述;中国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现当代变革;等等,都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课题。

我们把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为一项任务。这一视域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当有待于来者辛勤而富于洞见的发掘与开拓。本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与时俱进,并因此显示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哲学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如若以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担当,来从事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一研究领域将很快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目 录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序 / 吴晓明、邹诗鹏、王金林	1
导言	1
第一章 “世界历史”之为“普遍历史”的“思想”前提	14
第一节 历史何以为“普遍历史”	15
第二节 绝对：从“理念”到“精神”	18
第三节 “主体即实体”与“实体即主体”	31
第二章 “自由理念”的历史进程与逻辑环节	46
第一节 “世界历史”的现象与实情	47
第二节 自由理念在世界历史中的实现历程	52
第三节 客观精神中自由理念的逻辑环节	64
第三章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进路	79
第一节 “市民社会”之为“现代世界自身”	80
第二节 “对象性本身”和“对象性活动”的发现	91
第三节 关于“异化”的基本经验与“人类历史”的感性基础	101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	113
第一节 “现实的个人”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起点	113
第二节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再考察	124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为“历史科学”的初步尝试	135

参考文献

结语 148

参考文献 159

附录：博士论文后记 164

后记 166

167 “科谱”既“念思”从：张彦 章二第

168 “科谱”既“念思”从：张彦 章二第

169 章二第

170 章二第

171 章二第

172 章二第

173 章三第

174 章一第

175 章二第

176 章二第

177 章四第

178 章一第

179 章一第

180 章一第

导 言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本质地关联到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当代意义的估价。所谓“基本性质”,指的是“哲学—存在论基础”的定向;而所谓“当代”,首先意味着“后黑格尔时代”,并且不仅仅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基础上的“后黑格尔”,同时意味着一种未来向度,意味着为“克服”人类现代性困境而做的一种生存“筹划”。因此,形而上学批判和现代性批判,自始就是本书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之差别的基本语境。

一、“历史”主题之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绝对”意味

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历史”成了考察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原则差别的中心和起点?

提起“历史”,我们最常想到的,或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叙述和研究,即历史学。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性或迁延性,历史实在可以泛化到用来指涉一切存在,一切的存在因而也可以成为历史学的对象。但我们实际上又知道,那作为过去发生之事的历史虽然森罗万象,而当我们如此来思量时,所意谓的却不过是一种最单薄的表象。一旦我们试图了解知悉,或者追思涵泳,就不免时空位列,囿别区分。因此,我们总是先带着某种兴趣而来亲近历史的某些面相,而今天人类的学问门类也并不统摄于“历史学”之下。相反,历史学正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种,日益安享其独特的知识地位,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带着谦恭的口吻来表达他们的自豪:我们只是谈论确切发生过的事实。

问题是,就我们的论题而言,亦即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而言,“历史”是否有其特别的含义并因而成为本书的起点和中心?还是仅仅因为马克思所涉足的主要是所谓“历史的领域”,因而他的哲学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因而还有必要据此寻求或补建一种更为普遍的哲学基础(如所谓“辩证唯物主

义”)并将它推广到其他种种领域(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

在我们看来,实际的情形是:“历史”,不仅自马克思而且自黑格尔开始,就有一种比上述“指涉一切存在”更为普遍也更为根本的哲学用法,而遑论作为诸学科或诸领域之一种的“历史”了。黑格尔将他的《哲学全书》划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其中“精神哲学”并不称作“历史哲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因为“历史哲学”所达到的最后境地正与“哲学史”的最后境地相同,此境地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全书》试图陈述的对象。尽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确实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叙述,但“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哲学”却不仅仅是“世界历史”,而是“历史本身”,是“普遍历史”或“历史理念”^①。用黑格尔的话说,《历史哲学》是通过叙述“世界历史”而扬弃了“世界历史”,因而是对人的理想存在即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真正的“辩证论”^②。因此,作为“历史本身”的“历史”或“历史理念”,首先不是囿别区分的“历史学”的对象,也不是过去发生之事的集合或一切存在者的整体,而是先于或超越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或“事件”考量之上对历史的哲学洞察,亦即一切在时空和范围中考量“历史”的活动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

由此可见,当前流行的,对“历史哲学”作“思辨的”和“批判的”两种区分^③,并将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都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类型的看法是不相宜的。因为一方面,“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区分不但实际上根源于“历史”一词的上述两种惯常用法,而且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往往意味着与一般“历史学”相同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这种对象的“历史”实际上可能已经比“指涉一切存在”或作为“一切存在者整体”的“历史”还要狭隘;另一方面,“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划分过于强调了形而上学与知性科学的对立,而不知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与对“历史学”的批判性考察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两者都旨在赢得或修正关于“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作是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甚至与一般“历史学科”相对待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只能是贬低了黑格尔。同样,

① “理念”(Idee),王造时先生所译《历史哲学》中作“观念”,但黑格尔大多数著作的中文本的通行译法是“理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68—469页;“辩证论”(Theodicaea)或译“神正论”。

③ 可参看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第1—5页;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0页。

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当作某种“领域”，亦即作为与一般“历史学”的同等对象来看待，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退回到“黑格尔之前”。

因而，“历史”之所以成为我们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起点和中心，乃在于无论是黑格尔所实现的西方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换一种说法是“终结”），还是马克思所施行的哲学革命，都本质地关联于“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都具有“绝对的对象”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黑格尔之前，人类已经有了大量的历史撰述，并在形而上学中通过自然、存在、逻各斯、理念、灵魂、上帝、思维、意识、理性、精神，甚至肉体等话题沉思过“历史”之“真理”。但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重复人类古老思想和信念，而是将这一切沉思所赢获的思想和信念收入自身的哲学之内，证成一个内在一贯的真理的科学体系，即通过概念的中介亦即通过概念自身的辩证进展，将哲学建立为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知识。我们可以说，正是自黑格尔始，“历史”才得以摆脱被单纯看作偶然事件的前后相继的地位（虽或承认其中有命运与天意，但又认为非人类智力所及），而真正成为哲学知识的对象。并且，我们后面的考察还将表明，黑格尔的“自由理念”也确实表达了——尽管是以同时掩盖另一重真相的方式——现代世界的“真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念”的批判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内涵——哲学—存在论变革和现代性生存原则的批判。

二、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诸种定位的先行考察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亲缘关系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这一关系的实质性判断却一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简明起见，我们将从以下三条线索来考察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诸种定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和一般西方学者的判断。

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由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奠定其基础的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释路线。这种解释路线最大的特点是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因而强调费尔巴哈相对于黑格尔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优先地位。与此相应，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把握当中：无论是梅林，还是普列汉诺夫，都把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不加区别地等于传统唯物主义。对于梅林来说，马克思与传统唯物主义者相比，不过是将“唯物主义”的原则推广到了所谓“历史”的领域，这种在后来颇有影响的“推广”说实际上既误解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也误解了马克思意

义上的“历史”。普列汉诺夫无疑比梅林更加重视黑格尔,但他同样未曾领会马克思在存在论基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仅仅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存在论基础归结为费尔巴哈,甚至归结为斯宾诺莎,然后要求在这一唯物主义的“实体”(自然)基础之上补充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可以说,“自然+历史”、“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哲学”,就是他们定位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种关系定位中的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低于黑格尔本人甚至低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其理论的后果是,马克思哲学一方面被解释为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被解释为经济决定论(科学)。

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反对的就是对马克思哲学作传统唯物主义的退行理解,因此他们一致要求取消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解释中的优先地位,而力图恢复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关联。这种要求鲜明地体现在卢卡奇对黑格尔总体性范畴、柯尔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以及葛兰西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性概念的强调中。无疑,在他们力图恢复马克思哲学理解中黑格尔因素的优先地位时,也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一样强调了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但对于马克思究竟怎样超出了黑格尔即一切传统形而上学这一点,仍然是未曾得到真正澄清的。在他们清洗正统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同时,并没有就“基础”领域自身展开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对话,或者说对总体性、辩证法、内在性等概念的强调仅仅限于一种哲学“方法”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从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当他们相当一致地批判马克思哲学解释路向中的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时,实际上局限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或斯宾诺莎的对立,也就是说,止步于形而上学之全体相对于形而上学之片断的优先性当中。对峙的关键并不针对黑格尔哲学本身,而所谓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争,也没有呈现出费尔巴哈在存在论基础上对黑格尔哲学可能具有的颠覆性质。因此,将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内在环节的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领域的变革,尚未真正进入第二国际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视野之内^①。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中,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联的探讨作

^① 对上述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阐释定向以及费尔巴哈之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积极意义的详尽分析,请参看吴晓明先生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

出了较大贡献的是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阿多诺的用心在于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甚至整个哲学的思想努力归结到纯粹否定性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立场”,仅仅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但是当他将“同一性”仅仅归结于“思想”的产物时,同一性的统治仅仅表现为人们错误地信赖了“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的概念,表现为“同一性思维及其融贯一致性逻辑”的统治^①。这样一来,所谓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就被看成仅仅是意识形态批判,是客观事物自身的非同一性对“思想”的同一性的反抗。因此,“否定的辩证法”被规定为一种“反体系”,即“试图靠逻辑一致性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代替居最上位概念的至上性。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观性的谬见”^②。在我们看来,阿多诺的失足之处,在于用“同一性”批判救平了形而上学内部诸层次之间的差别,同时将“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固定在“意识形态”和“客观现实”的僵硬区分中。因此,一方面“基础”(客观现实)似乎成了永不可及的事物自身,另一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别好像仅仅是对同一个基础自身的不同解释,仅仅在于马克思具有了一种更自觉的自我批判维度。

相比之下,马尔库塞明确地认识到:相对于黑格尔而言,“在马克思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他由此正确地指证了,黑格尔体系中所有的范畴都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而马克思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了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因而“就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总体的一个谴责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马尔库塞还强调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与无产阶级的存在所预示的实践批判之间的关联,并且指明马克思洞察到了“社会劳动过程中个体的起源”以及“劳动过程怎样成为人类解放的基础”^③。可以说,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继卢卡奇之后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了解得最深入也是最好的一位哲学家,但他的不足同样在于未能真正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存在论基础上的差别。他所谓马克思与黑格尔“基础”的不同,不过是由“哲学”到“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同,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哲学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充分表现形式”及其“批判趋向的充分表现形式”。马尔库塞甚至不加区分地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并列在一

①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285页。

② 同上书,“序言”第2页。

③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35—236、239页。

起,认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都是通过“人类的具体化”从而把“哲学的否定”提高为“哲学的实现”和“人类‘普遍本质’的实现”,是这一意义上的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①。

如果说,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未必能精确地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原则差别,但都至少认定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话,那么,把马克思当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继承人则可以说是一般西方学者的通行看法。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马克思往往直接被当成与黑格尔并无二致的形而上学家,所不同的无非是马克思同时还被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而在我们看来,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对黑格尔哲学有较好的理解因而能够相应地比较深入于马克思的哲学语境的评价,哪怕这种理解和评价同时有时是极其尖锐的批评。

这里要略为提及的是海德格尔、科耶夫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与尼采一样是对黑格尔“绝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并由于此一颠倒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不过是更为激进,或更加世俗化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在消极意义上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相反,科耶夫是在一种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意义上把马克思看作是黑格尔的继承人的:“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东西处在黑格尔主义之外”,“世界的未来——从而也就是现在的意义和过去的意义,说到底,取决于如今解释黑格尔的方式”,而“每一种对黑格尔的解释——只要它不是闲谈——无非是个斗争(*lutte*)和工作的规划(这些规划之一叫做马克思主义)”^③。伽达默尔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是在一种既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不同,又与科耶夫的“历史终结”不同的语境中来进行定位的。他注重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演进的效果史,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实际上是黑格尔“主观精神批判”的历史延续,而“生产关系”理论与“世界精神”学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两者都试图解答“主观精神同客观精神”的“和解”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一个杰出的尽管表面上是与之相反对的继承人。因此,他甚至在谈到人们对待

①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② 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6页;另外,可参看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9页。

③ 科耶夫:《黑格尔、马克思和基督教》,见《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4—25页。

海德格尔抛弃的态度时要呼唤一个“海德格尔的马克思”^①。

从以上的简略考察中,我们发现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作或纯粹继承或批判超越的简单判断,而在于如何就他们的哲学尤其是存在论基础本身阐发其间的内在关联与本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马克思的判断水平首先取决于是否严肃地对待了黑格尔。

三、对可能加诸黑格尔或马克思历史观念之批评的先行考察

在一般关于“历史观念”的讨论中,马克思常常与黑格尔一同被归结为“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家。因此,在具体地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差别之前,我们要略加考察的是一些可能落到马克思或黑格尔“历史观念”之上的基本批评。大致说来,这些批评都可以被称作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一般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实际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历史决定论,对这一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的批判以卡尔·波普尔最为著名,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深度远远不及卡尔·洛维特通过考察“世界历史”的“救赎历史”前提所展开的批判;其二是历史相对主义,对这一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做出的杰出批判当然首推胡塞尔,而列奥·施特劳斯对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可以看作是胡塞尔工作的延续。对上述两重历史主义的批评尽管好像彼此相反,但都被不同的作者毫不犹豫地加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头上。

我们先来简单考察一下波普尔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的批评。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历史决定论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虽然他承认并不怀疑马克思的“追求真理的真诚”和“理智上的诚实”,甚至也并非主要地去指责所谓马克思的“错误的预言”,而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②。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区分是对哲学或科学提出“实用主义”的要求,因而包含着“科学预测”这种重要的、方法论

① 参看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14—117页;《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第10页:“黑格尔一个时期在德国、以致在欧洲完全占统治地位,然后在19世纪中叶就全面瓦解;同样,海德格尔也长期统治着德国的思想舞台,今天的被抛弃也是很彻底的。人们今天期待着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人,尽管他是黑格尔的对手,他却抗议说,这个伟大的思想家被当作了死狗。”

②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142页。

的发现,但问题是马克思“固执于如下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只有当未来被前提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如此一来,马克思简直成了一个要求对历史全知全能的决定论者,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波普尔本人的想象。他把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工艺学意义上的“完全预测”的要求强加给马克思,然后批判这种“全知全能”的决定论的“贫困”,主张“我们要的不是整体论”,而是“零星社会工程学”^①。

与波普尔几乎完全在知性范围内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不同,卡尔·洛维特批判性地考察了包括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内的“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他在马克斯·韦伯和汤因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判定《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一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吁”,并因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②。洛维特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是相当明显的,他同波普尔一样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经济基础”理解为现代生活中的诸要素或诸领域之一种,从而完全在“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理解“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且不去追究这种在西方学者中极其普遍的误解,而是要问,把“共产主义”还原为“弥赛亚主义”,其究竟意图何在?

这种“还原”最表层的意思,就是通过将一种见解宣称为“历史目的论”来了结它的“真理性”。当然,洛维特尚不至于如此浅薄。在他看来,“历史目的论”的实质是追问历史的“终极意义”问题。这个由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提出的、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的“漫无边际的问题”,把人们投入到“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中。而反过来说,当现代人既抛弃了古希腊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又不接受基督教的创世和末世说,却保留了“进步”(基督教)和“永不止息的连续运动”(古希腊)的观念时,必然面临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犹豫不决的“意义”困境^③。因此,洛维特整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与其说是通过将诸种“历史哲学”归结为“弥赛亚主义”来指斥这一切历史思想的努力,不如说他正是试图以“历史目的论”或“历史终结论”的不可避免来论证或启示所谓“弥赛亚主义”亦即“终极意义”问题本身对于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但在我们

①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212页。关于波普尔所谓“决定论”的纯粹知性科学的用法,可以参看《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序”,华夏出版社,1987,第1—2页。

②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三联书店,2002年,第51—53页。

③ 同上书,第7、247页。